

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环境问题

李建新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1)

摘要: 西部地区是相对贫困、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将遇到贫困、人口压力和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 以及开发、发展与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类两难问题, 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问题。本文就此作了探讨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贫困; 环境问题;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2)01-0011-07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blems in Developing West China

LI Jian-xi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stitut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West China is a relatively poor area with damageable environment.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West China certainly will encounter with the conflicts among poverty, pressure from the big population size and environment worsening, and the conflicts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breakage of environment. How to deal with the dilemma is a key issue in developing West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is issue and mak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Keywords: poverty; environment problem; sustaining development

一、引言

西部大开发战略, 倍受世人瞩目, 这一战略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区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 也关系到东部地区乃至全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在 2000 年 3 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朱镕基总理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了充分的论述。他指出, 实施西部大开发, 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战略, 是党中央贯彻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思想, 是面向新世纪所做出

的重大决策。西部大开发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对于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边防,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 由于自然生态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西部大开发中将会遇到不少问题和困难。而其中贫困、人口与生态环境恶化, 以及开发、发展与环境破坏就是首先应当关注的主要问题。

收稿日期: 2000-11-24

作者简介: 李建新, 博士,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二、西部地区的基本特征和条件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在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科学院在2000年度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台、港、澳)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可持续发展总能力的评价,结果排在后10名的除山西省之外,都是西部省、区,而排在前10名的除黑龙江之外,都是东部省、市^[1]。这一排序,既反映了我国西部地区的落后,也较全面地反映出了东西部地区的差距。

中国科学院建立的这一套指标评价体系旨在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现状、能力和潜力。决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可由以下五个基本支持体系以及其间的相互关系来衡量。这五个基本支持体系分别是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和智力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指标主要包括生存资源禀赋(土地、水、气候资源等)、农业投入水平、资源转化效率、生存支持能力等四个方面。综合评价的结果是,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西部地区的省、市、自治区绝大部分排列在最后。

发展支持系统指标主要包括区域发展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等)、区域发展水平(经济规模、经济推动力、结构合理指数)和区域发展质量(经济效益、产品质量、集约化程度)等三个方面。综合评价的结果是,排在最后的20~31名中除第27名山西省以外全都是西部省区。

环境支持系统指标主要包括区域环境水平(“三废”排放、大气污染等)、区域生态水平(地理脆弱程度、气候变异、土壤侵蚀等)和区域抗逆水平(环境治理水平、生态保护水平等)等三个方面。综合评价的结果是,排在最后11名的地区除辽宁、北京和山西之外,都是西部省区。单从区域环境水平指标看,西

部地区由于工业化水平较低,环境污染不是严重地区,只有内蒙古和宁夏列在后10名中。相反,发达的上海、北京、辽宁分别排在倒数三位。几乎没有大型工业、最少受到环境污染的西藏排在全国第一名。从生态水平指标看,排在最后的第20~31名的地区分别是藏、辽、津、冀、陕、滇、川、甘、渝、晋、新、宁,大部分是西部地区的省份。从区域生态环境抗逆水平看,西部地区的12个省、市、区排在后第19~31名,可以看出,西部绝大部分地区不仅生态环境脆弱,而且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的能力偏低。

社会支持系统指标主要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人口发展指数、社会结构、生活质量)社会安全水平(社会公平指数、社会安全指数、社会保障)和社会进步动力(社会潜在效能指数、社会创造能力指数)等三个方面。综合评价的结果是,西部地区的12个省、市、区无一例外的排在全国的最后面。

智力支持系统指标主要包括区域教育能力(教育投入、教育规模、教育成就)、区域科技发展能力(科技资源、科技产出、科技贡献)和区域管理能力(政府效率、社会经济调控指数、环境管理)。综合评价的结果是,除陕西省具有一定的科技实力排在第6名,甘肃、内蒙古、新疆居中,分别排在第14、15、16名以外,西部大部分地区都在全国的后列。

综上所述,西部地区无论是自然生态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等各个方面都处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是落后的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有着显著的差距。

三、贫困、人口与生态环境

西部大开发首先遇到的是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实际上,这里的贫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而是一种全方位的泛“贫困”。从上述总体情况来看,西部地区的贫困主要表现在发展贫困、人口贫困和生态环境贫困。发展贫困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科

学技术发展实力以及发展潜力的落后与贫困;人口贫困主要体现在人口的健康、人口的文化素质、思想观念等的落后与贫困;生态环境贫困主要表现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等方面。在西部地区,多种“贫困”重叠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发展贫困影响到人口贫困;人口贫困又可影响到生态环境贫困;而生态环境贫困又进一步影响到发展贫

困,反之亦然。这是一个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恶性循环圈。中央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明确提出了要“退耕还林”等十六字保护生态环境的重大措施,显示了中央首先要以生态环境贫困为突破口让西部地区走出这种恶性循环圈的决心。

从人口的角度,要走出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圈,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表1 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各种人口指标的比较

地区	增长率 (%)	预期寿命	婴儿死 亡率(‰)	文盲率 (%)	人均 GDP	农民年人 均纯收入	贫困县比例 (%)	少数民族比例 (%)	HDI
全国	9.53	68.55	27.3	15.78	6392	2161	20.68	8.08	0.515
北京	0.70	72.86	8.8	6.51	18482	3952	0.00	3.83	0.628
天津	3.40	72.32	10.7	10.43	14808	3395	0.00	2.31	0.605
河北	6.83	70.35	9.2	12.00	6525	2405	22.67	3.94	0.528
辽宁	4.58	70.22	18.7	8.17	9333	2579	9.00	15.63	0.558
上海	-1.80	74.90	12.4	10.19	28253	5406	0.00	0.47	0.676
江苏	4.13	71.37	15.0	19.59	10021	3376	0.00	0.23	0.554
浙江	4.82	71.78	17.1	16.37	11247	3814	3.41	0.51	0.556
福建	5.33	68.57	23.0	18.70	10369	2946	9.52	1.55	0.520
山东	5.46	70.57	12.9	22.05	8120	2452	18.18	0.60	0.528
广东	10.90	72.52	15.9	9.25	11143	3527	2.46	0.57	0.568
海南	12.92	70.01	29.2	14.27	6022	2018	25.00	17.03	0.517
内蒙古	8.23	65.68	29.0	15.83	5068	1981	30.69	19.42	0.489
广西	9.01	68.72	44.0	13.32	4076	1971	25.45	39.24	0.506
重庆	5.51	—	—	15.45	4684	1720	30.00	—	—
四川	7.48	66.33	38.4	15.70	4339	1789	17.22	4.56	0.491
贵州	14.26	64.29	52.4	28.98	2342	1334	55.81	34.71	0.439
云南	12.10	63.49	65.8	25.48	4355	1387	57.03	33.42	0.419
西藏	15.90	59.64	96.2	59.97	3716	1231	6.41	96.32	0.331
陕西	7.13	67.40	22.0	16.52	3834	1405	46.73	0.48	0.491
甘肃	10.04	67.24	31.5	28.65	3456	1393	47.67	8.30	0.450
青海	14.48	60.57	66.3	42.92	4367	1424	32.56	42.14	0.407
宁夏	13.08	66.94	37.3	25.56	4270	1721	33.33	33.27	0.472
新疆	12.81	62.59	58.5	11.4	6229	1600	26.04	62.42	0.49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

其一,调控人口增长速度。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总体来讲要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系统脆弱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更高。这些地区过快的人口增长无疑加重了贫困和生态问题。因此,适度地调节这些地区的人口规模,搞好计划生育,有利于摆脱贫困与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文化习俗差异大,切忌控制人口中的急功近利和计划生育中的“一刀切”现象。全国70%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西部,西部地区是贫困的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从表1看到,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3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人均收入较低;另外还看到,这些地区人口的健康水平较低,不仅反映在平均预期寿命上,而且表现在婴儿死亡率上。例如,西藏婴儿死亡率竟高达96%,云南、青海超过了65%,贵州、新疆也超过了50%,其他西部地区都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许多。因此,在这些贫困、高生育水平、高死亡率水平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计划生育,不能完全照搬内地的计划生育经验,要将控制型计划生育转变为服务型计划生育。较高的婴儿死亡率必然与较高的生育水平相关,少数民族实施计划生育应该从降低婴幼儿死亡率、提高妇幼保健水平入手,建立健全各种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的技术服务体系,为贫困人口、少数民族人口提供免费的计划生育和医疗保健服务。此外,少数民族由于宗教文化、生活习惯不同,对计划生育的理解也不同。例如,新疆少数民族90%以上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教义与计划生育存在着某些不一致的地方,在这些地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就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加强宣传教育,使计划生育工作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实施好计划生育,才能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其二,全面提高人口素质。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各种地方病与常见病流

行,甚至有不少数量的痴、呆、傻、残人口。提高人口素质首先要抓好“源头”,要加强西部地区人口生殖健康的服务,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要搞好“优生优育”工作,降低出生婴儿缺陷发生率,坚决杜绝近亲结婚、弱智人群通婚的现象。其次,要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西部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西部地区文盲、半文盲人口的比例除个别省区以外,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更是差距明显(见表1)。从基础教育水平来看,在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上,西部地区与全国和东部地区存在着差距。12个西部省区中,有一半的升学率不到90%,其中贵州、云南和西藏的不足80%。西部地区女生升学率与全国特别是与东部地区相比,更是差距不小。显然,如此低素质的人口不仅制约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对人口的生育、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产生消极的影响,极不利于西部地区摆脱多重贫困的恶性循环圈。因此普及基础教育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应当成为西部大开发中重要一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是多方面的,但最不可忽视的差距是思想、观念上的差距。这种差距是由于边远落后、信息闭塞造成的。因此,应当加快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通讯文化设施的建设,扩大与外界交流的能力,不断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只有这样,才能把握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谋求更大的发展。

其三,鼓励贫困人口流动、迁移。西部多是地处高寒、荒漠、干旱、石山地带,多是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区。过去由于人口增长过快,粗放耕作经营,使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形势更加严峻,再加上森林草原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这一切都严重地制约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严重影响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因此,要摆脱西部地区多重贫困怪圈,除了认真执行国家采取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许

多重大措施,如在大江大河上游禁止森林砍伐,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等,以及控制贫困地区人口过快增长以外,还应当积极鼓励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动、迁移,特别是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一方面可以减轻脆弱生态环境上的人口压力,有利于摆脱贫困、人口、生态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圈;另一方面,西部贫困地区的人口,由于相对封闭,且流动性不大,所以其社会经济关系较多地囿于家庭、邻里、亲友、村落等狭小的血缘地缘社区,人们的价值取向也都根植并依赖于这种传统的农村社区,并形成了自给自足、知足常乐、得过且过的观念和行为习惯,缺乏进取精神,缺乏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鼓励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动和迁移,也将有利于贫困地区人口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走向富裕之路。

其四,发展小城镇建设,加快人口城镇化。早在80年代初期,费孝通教授就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著名文章,论述了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于人口稠密的东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小城镇,一方面可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加快人口城镇化;另一方面,城镇建设和发展又可反过来带动农村的发展,克服“城市病”和“农村病”,为城乡均衡发展创造条件。对于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人口城镇化显得更加重要。一方面可以加快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普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发达省区。东部地区的实践证明,加快人口城镇化,将极大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把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人口吸收进来,减轻人口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压力,以便使这些地区顺利地实施“退耕还林”,恢复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彻底摆脱多重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为了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加快人口城镇化,应当在相关政策上有所调整和突破,如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促进贫困

地区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允许贫困地区的农民离土离乡,取消从农村到城镇、从小城市到中心城市的种种限制。这些措施一旦实施,将对加快西部大开发起到积极的作用,使西部地区尽快摆脱贫困。

四、开发、发展与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扩张规模、经济结构转变升级和人民生活提高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全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小,特别是东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差距正在扩大。以经济指标GDP为例,1978~1997年东部地区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由52%上升为61.4%,西部地区则从17%下降为14.8%。人均GDP差距也逐渐拉大,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各省区人均GDP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在1998年全国人均GDP为6392元,西部人均GDP仅为4009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7%。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都已超过10000元,是西部绝大部分地区的2倍以上。东部地区人均GDP最高的上海为28253元,是西部地区人均GDP最低的贵州省的10倍以上,可见,东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大。

中央在世纪之交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为了缩小地区差距,协调地区发展,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事实上是加快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赶上发达的东部地区。然而,西部地区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会遇到各种环境问题。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自身现代化实践来看,经济发展与环境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纵观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历程,不难发现,无论是发达的先进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后进国家,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经济开发和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环境破坏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工业化发展而发生的。西方学者对发

展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 环境恶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倒 U 型曲线关系, 即在经济起飞初期, 环境会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恶化,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环境恶化会得到遏止并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好转。发展与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 得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验证^[2]。中国自身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也证实了这种关系。事实上, 自建国以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环境状况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不断恶化, 特别是乡镇工业, 显然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从横向分析看, 中国由西部地区到中部、到沿海发达地区工业污染逐步加重。从环境污染的综合情况(如“三废”)来看, 越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 环境压力指数越高, 即环境污染越严重, 环境质量越差^[3]。目前, 从全国整体来看, 工业化程度高、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是环境污染相对严重的地区。但是另一方面, 各地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 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也在加大。事实上, 近些年环境污染已在一些发达地区率先发生了转变。以北京为例, 北京的环境污染比 10~20 年前更严重, 1998 年市区“空气污染指数”四级周数由 1997 年的 14 周增加到 20 周, 达到前所未有的恶化水平。面对这种情况, 北京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加强环境污染治理的力度, 增加环保的投入, 提高产品技术含量, 促进产业升级等, 2000 年, 北京市大气污染已明显好转, 出现了随着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 环境质量发生转变的迹象。实际上, 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与环境这种关系时发现, 发展水平与环境恶化之所以呈现这种倒 U 型曲线关系, 是由于受到下列因素影响, 经济发展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环境管理和投入以及环境质量需求等^[4]。

如果说环境恶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 U 型关系有一定必然性的话, 那么在某种程度

上, 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大发展就不可能完全避免环境破坏和环境恶化, 关键是选择怎样的开发战略才能尽可能地避免不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保护”的传统工业化道路, 才能尽最大可能地减少环境破坏和环境恶化。开发大西部, 缩小东西部的差距, 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要缩小东西部的差距,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水平, 要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要高于东部发达地区的水平, 只有这样, 才能缩小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那么, 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质量, 如何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保证环境保护, 这些都将是西部大开发必然面临和必须解决的两难问题。

从空间维度来进一步分析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可以发现, 在一定空间区域下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处在同一个发展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 由于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不同的发展阶段, 因而会存在环境保护综合能力的相对差异。这种差异对污染者的直接作用表现为在不同的地区, 强制污染者降低环境破坏的压力和标准有所不同, 间接作用表现为在不同地区, 污染者为降低环境破坏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不同, 即发达地区支付的环保成本较高, 而落后地区支付的环保成本较低。在市场机制和区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的支配下, 必然形成高污染的技术和产业集中于落后地区, 低污染的技术和产业集中于先进地区的格局, 这就是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在空间维上的表现形式^[5]。实际上, 我国目前城乡工业污染的二元格局正是这种写照。城市由于环境管理较严, 环境治理成本高, 因此, 城市的高污染的技术和产业都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 形成了“污染下乡”, 落后的农村地区也就成为了城市的环境殖民地。

目前, 我国东部是较发达地区, 西部是欠发达地区, 处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水平上。东部地区不仅经济发展水平高, 技术密集型

产业多,而且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也较强。西部地区由于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环保投入低,因而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大高于工业发达地区如江苏、上海、山东、广东等地。东部发达地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保投入会不断增强,产业结构会不断调整,产业升级会不断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部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来西部开发,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劳动密集型、高耗能型以至部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也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东部地区的高污染的技术和产业也不可避免地向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转移。事实上,已经有一些东部地区技术含量低、环境污染大的陈旧机器设备转移到了西部,形成了工业污染的西部转移。

西部开发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为了避免东部地区的工业污染西迁西移,必须高起点、高目标,必须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要遏止东部地区的淘汰企业、淘汰产品迁入西部,积极鼓励东部地区的优势企业进驻西部,开展经济技术协作,技术扶贫、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对西部地区的传统工业,要依靠科技进步推进工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产品结构的升级。大力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新兴产业,发展环保产业等。只有摆脱传统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西部可持续发展的大开发战略。

五、结语

西部地区绝大多数既是贫困欠发达区,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必然会给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影响。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如果不顾及生态环境的破坏,使之进一步恶化,那么,这不仅将导致当地发展能力的下降乃至丧失,甚至可能会对东部发达地区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人们也许不会淡忘1998年长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而此次特大洪水直接与长江上游的西部地区的森林砍伐、植被破坏、生态环境恶化有关。因此,西部大开发必须尽最大可能避免重复传统工业化、现代化的老路,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思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参考文献:

- [1]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 2000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2] K. F. Jal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Poverty Nexu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Occasional Papers No. 7, 1993.
- [3] 李建新. 环境转变论与中国环境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 2000, (5).
- [4] T. Panayotou.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 Ahmed and J. Doelman eds., Beyond Rio: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5.
- [5]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 城市与乡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周皓]

注: 感谢于学军博士在本文写作中提出的宝贵意见。